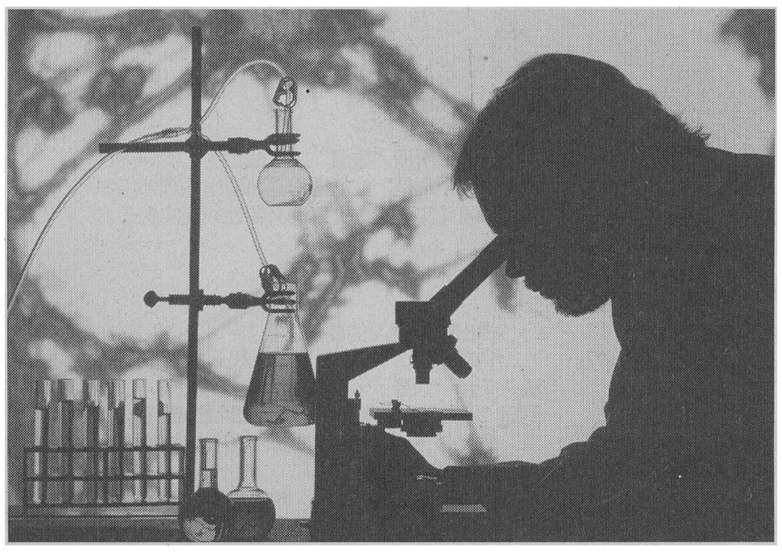
为什么公共健康需要伦理分析?

口肖　巍



公共健康（public health）已经越发地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公共健康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通常人们把它定义为“通过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来实现的预防疾病、延长生命和保护健康的科学和技术。”“公共健康是指导维持和改进所有人健康的科学、实际技能和信念的综合。”“公共健康是地方、国家、民族和国际资源的组织形式，旨在强调影响各个社会的主要的健康问题。”然而，笔者同意一个简单的定义，公共健康就是指公众的健康。这里面包括丰富的内涵，凡是与公众健康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理解为公共健康问题，如社会医疗体系与制度、社会卫生体制与应急系统、医院与医生、卫生医疗和保健资源的分配、劳动保护、卫生状况、环境保护、流行病、健康教育、交通以及一些个人行为，如性行为和吸烟等。同一般健康概念相比，公共健康具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重视“公众”和人口的健康，而不是个人的健康。如对于一个高血压病患，医生通常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位患者在这一时候患了这种疾病？”而从公共健康角度，医生则提出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口会患高血压？而这种疾病在另一些人口中却很少见？”二是以预防为主。其基本原则是为了群体健康对于疾病的预防，而不是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治疗和康复。三是涵盖范围大，包括所有与公众健康相关的问题。四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促进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必须通过社会的力量来实现。

公共健康为什么需要伦理分析？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公共健康是一个可以进行伦理评估的政治行为。这主要是由于：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时，它的总体健康状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健康权利是一个社会公民权利的基本体现，什么人在何时得到什么样的和什么程度的健康保健，以及如何获得它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公共健康依赖于基本的物质条件，例如食物、住所、水和卫生设施、清洁的环境、可预防和治疗的医学干预等，所有这些转而又取决于人们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机会，或者说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以及更具有根本性质的社会制度。因而，尽管表面看起来健康与公共健康属于卫生部门的工作，与政治无关，但实质上体现了人们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够实现。

其次，公共健康关系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公共健康领域，疾病和健康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也使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刻都在发生变化。疾病，如流行病关系到基本的公共利益问题，也涉及到个人与公众权利的冲突，一个人因患传染病而被隔离或许违背了他的意愿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伦理道德来平衡个人的基本宪法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从公共健康角度思考伦理问题与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视角不同。前者着眼于人口而不是个人的健康，着眼于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体病人的利益。这就需要医生和社会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当一个人患上艾滋病时，按照传统医学伦理学视角，医生应当对患者负责，保护他的隐私权，但从公共健康着眼，医生也必须对他人和社会的健康负责，这种责任要求他必须及时向有关人员和部门告知患者的病情。传统的医患关系强调患者的知情同意，尊重病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但从公共健康角度，在严重传染病，诸如非典肆虐时，首先应当维护的是公众的知情权。因此，在公共健康领域，这种通过对于疾病的防治和共同健康的维护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由伦理道德来协调。同时，公共健康也关系到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类也不断加速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的进程，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有识之士开始强调自然与社会环境、健康与发展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结合自然、社会、行为和生态看待健康问题。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新增添的疾病大约30余种，而大多数新疾病源于动物，这与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相关。长期以来，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是自然界的主宰，把自然工具化，不断地榨取自然，食用野生动物，使野生自然圈病毒不断地进入人类社会，例如非典病毒便与食用果子狸相关。因而，为了人类社会的公共健康，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以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自然。

再次，伦理学是一个社会公共健康体制建立和政策制定的基础。通常说来，从一个社会是否关注健康和公共健康具体到它的每一项相关的决定，都包含着各种伦理价值的选择与冲突。以我国目前的公共健康状况为例，我国公共性社会“最脆弱的窗口”之一是公共健康。有学者认为，我国卫生事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功能转型缓慢是公共健康处于“边缘化”的根本原因。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卫生事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伦理价值观和道德选择。在国力和资金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就存在一个让经费流向医疗，还是公共健康事业的伦理抉择。此外，在有限的卫生保健经费中，也存在着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每一社会关于健康、公共健康的制度和政策实则都是一定伦理价值观和道德选择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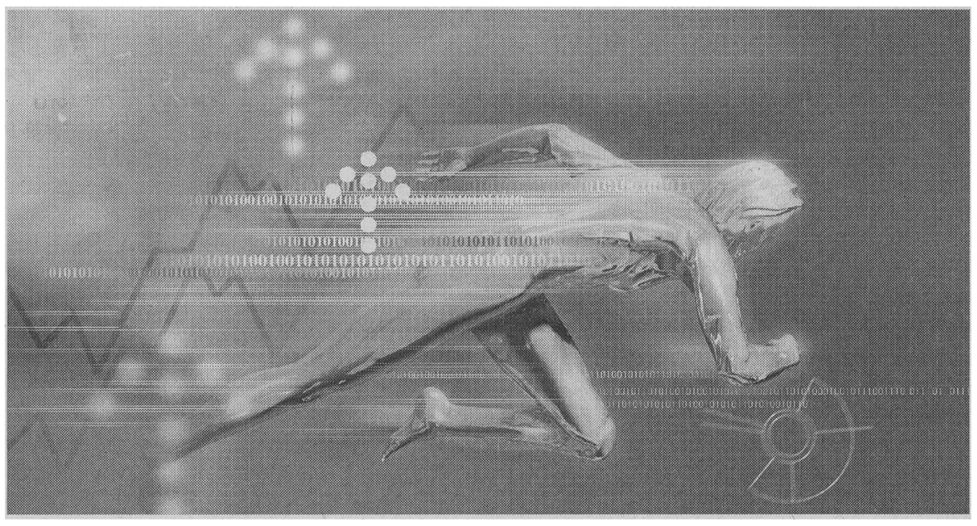
对于公共健康进行伦理分析的目的在于：1、当人们面临由患病所造成的身体上的和社会上的无序时，能够寻求到和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2、在各种威胁人口健康的疾病到来之前能够利用伦理道德手段“防患于未然”；3、在健康保健资源有限和分配不公的情况下，能够促使社会建立更为公正的公共健康体制和出台更有效、更可行的公共健康政策，使公共健康服务能够平等地落实到每一个公民，从而创造一个更为健康和幸福的社会。

十大观之伦理观
SHIDAGUAN　○宇宙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伦理观　○主权观　○人权观　○民主观　○民族观　○宗教观　○文化观

■人才强国

培养企业家

口王　雪　李跃新



培养企业家重要的是实践，是创造易于企业家生存的环境，而不只是创办若干正规化的学校。学校充其量只能传授给学员管理的技能和知识，培养出一些管理专家，但很难培养出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人才。

世界著名的通用公司GE人力资源总监是这样总结通用的经验的：“推功GE不断向前的是管理制度本身。GE创造了很多优秀的领导人。最近有人告诉我，说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的168家公司的CEO曾经在GE工作过。连我都有点惊讶。我知道有一些人曾经在GE工作过，但没想到有这么多。但我认为主要是我们的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写进了教科书。这是一个优秀的制度。我认为，继续培育和发展优秀的人才，不容忍平庸，已经成为所有人对GE的期望。”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这种选用优秀人才的制度和环境。有时制度是好的，执行起来就变了味，把平庸人选到重要岗位，还说是择优录取，选的领导是优秀的、胜任的。为什么我们不容易选拔和培养出优秀的企业家？关键是缺乏一种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机制，这就需要我们转变培训理念，建立科学的企业家培训机制并营造一种有利于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环境。

在GE的110年历史中，总共只有9位董事长。这对于一家产业公司来说是个骄人的纪录。GE的几位杰出领导人：欧文·杨、杰克·韦尔奇和现任领导人杰夫·伊梅尔特，都是从GE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GE给了他们很多机会、培训、挑战，并最终把他们培养和历练成世界知名的企业家。

GE以及为数众多的CEO们的培养和成长路径大体都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进入某一领域的头5年。首先，他们都在自己的技术领域取得了成功，他们很深入地了解这个行业，了解其复杂性，而且都在与此相关的工作中获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这正是GE在他们的初级发展培训项目中提供的。其次，他们会接受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做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它培养了他新的能力，一种从事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不同工作的能力和自信心。第三，为他们提供早期的领导机会。GE在第一阶段就为那些初出茅庐的，未来可能的企业家们提供诸如“财务管理培训”、“技术领导项目”以及“6个西格玛质量标准”的培训。

第二阶段是进入本行业5—15年。此时他们已拥有了对一个团队的管理责任。他们对整个机构的业务有广泛的参与并且有机会接触重要人物，有机会同他们所仰慕的高层人士——他们心目中的“榜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一阶段GE的培训项目包括“新经理发展课程”、“中级培训项目”、“中级经理课程”以及管理技术、策略和技巧等。力图让这些受训的经理们成为真正的经理。对于授课，GE利用内部管理人员教授课程，而并不总是依赖于职业教师。公司内部的经理就经常授课。每次课讲两到三个小时。

在这一阶段还给学员范围广泛的有关公司整个业务的作业和任务。培养他们跨越职能部门处理问题的能力。

第三阶段使他们成为该机构的决策者。在这一阶段受训者们已对工作负有全权责任，同时他们已有了广泛的个人关系网络。换言之。他们获得了领导能力并且扩展了个人关系网。此一阶段，GE的管理学院设置了“高级经理发展课程”（MDC）“商务管理课程”（BMC）“高层管理人员发展课程”（EDC），这三门课程是GE最高管理人员的发展课程。每门课都为时三周半。在纽约的克劳顿村举行，也就是公司的管理学院。在杰克·韦尔奇担任CEO的20年中，学院举办过280次此类课程，他每次都参加了授课。只有一次例外，是因为他住院，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每次讲课，他都要讲两到六个小时，教授领导能力。此外，GE还用顶级培训项目等培训方式来帮助学员学习和自我发展。

总的来讲，GE培养领导人的成功之处在于：首先是招募杰出人才。他们全方位招募最优秀的人才为公司服务。其次，GE创建了强有力的业绩文化，强调业务结果，并创造了一种优良的机制和环境，让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GE每年提升评估中最优秀的20%，也奖励中间的70%，只是对他们的奖励没有那么大或者提升得没那么频繁。最差的10%，给他一个改善的机会，如果还没有起色，就要走人。第三，强调共享的价值观。GE不断教育人们，诚信、业绩和追求变革。第四，提供优异表现的机会，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岗位和挑战极限的机会，让人们去从事更多更重要的工作，让受训者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第五，通过有序的程序来进行业绩评估和升迁前景评估，进而奖励最优、淘汰劣者。第六，培训和岗位锻炼紧密结合，相应的岗位有相应的培训，并且培训必定是行之有效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培训。

我们的各级培训机构应如何培养出胜任市场经济要求，适应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家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正确定位培训的概念

企业家的培训属于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强调：自我导向式学习，生活式学习，经验学习圈。培训的目的不只是灌输知识，重要的是改变人的行动。培训是开发大家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是人力资源开发、培养高级管理骨干，提高人的素质技能和改变人的思维；是企业实施战略目标的首要步骤；是培育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凝聚力的途径。所以培训和传统的学校教育在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目的及教师的作用等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培训是要解决问题，要管用，重实效,讲效益,培训是有组织的超前性工作，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支持系统。

2、设计新的培训模式

企业家的培训模式应包括：（1）分析企业家培训的现状，找出存在的优势和劣势。这一步需大量调研工作，并和国外大企业培训作比较，找出差距。（2）结合中国国情，分析造成差距的原因，在明白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制定扬长补短的企业家培训战略。（3）确定培训需求：深入企业，用管理学等工具分析诊断企业，了解企业需改进的地方，了解经理实际工作水平，调查经理培训需求，了解各级管理人员真正想学什么，岗位和组织要求他们学什么，未来竞争和企业发展战略要求经理成为什么样的高级经营管理者。（4）商定培训目标:根据培训需求，和经理主管上级领导、人事部门及企业高层领导协商,针对不同班次制定不同的培训目标。（5）实施培训:开发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是实现培训目标的关键，例如：“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高级研讨班”，“企业战略与策略研讨会”，“管理技能演示班”，“创建学习组织与企业文化建设”，“领导艺术与领导心理”“领导潜能开发”等等项目。

3、设计能达到培训目的的培训方法

培训方法是根据成人培训理论设计的落实培训效果的方法。如，案例分析可提高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员通过做计算机模拟教学游戏，树立合作竞争，系统思考，团队精神等观念；角色扮演，讨论，谈心等方法都体现了一种做中学的思想，加深了学员的亲身体验，促使其行动的改变。如果只灌输知识，不能加深学员内心深处的理解和体验，就较难改变行动，培训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4、制定培训评估体系，及时进行修正

评估体系包括：对问题的评估(培训是否解决了问题)、对学员行为转变的评估、对培训项目本身的评估和对是否给企业带来效益的跟踪评估。

综上所述，只有培训机构、企业、政府、社会等多方面形成合力，才能使企业家的培养卓有成效。

■文化视野

西方文化研究述略

口范玉刚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二十世纪4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等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大众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文化工业”首先由阿多诺、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其含义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生产文化产品，并建立起一整套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因商品生产的标准化原则成为大众文化的原则，所以，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致使大众对“舒适”的文化的需求与儿童对糖果或玩具的需求毫无二致，大众文化不再提供任何内在的价值，只不过用娱乐的外衣掩饰了它的本性。他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通常的“大众文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有可能被误解成从大众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为大众所用的文化，从而遮蔽了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本质。而“文化工业”则一语道破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天机——商业流行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其最终目的同样是对商品最大利润的诉求，而且是被商业利益集团所控制和大众“自愿”受操纵的。其实，超越单纯的文化表象就学术匠心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大众文化理论是关联于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通过对社会经验的处理，用来解释大众的主观自然怎么会毫无反抗地就卷入到社会合理化的悖论中，以及物化现象在文化生产及消费领域中的种种表现。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是消极的、悲观的，得出了“现代大众文化”就是“社会水泥”的著名论断，并以其大众文化理论对文化剩余价值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

始于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肇端于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霍加特于1957年出版了《文化的用途》，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了《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63年出版了《漫长的革命》，汤普森1963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几本书为英国文化研究作了奠基性的工作。特别是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的成立，是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以至“文化研究”这个概念本身也要归功于伯明翰学派。他们不满于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力图从英国文学批评的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他们反对利维斯那种试图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以使人达到“高贵化”目的的精英立场，但他们继承了利维斯从社会功利方面看待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思路，威廉斯和伊格尔顿都严厉地批评了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在早期他们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发展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认为文化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研究的主题不只是文化产品也是实践和生产、分配、接受塑造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可以说，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他们基于本土的社会、文化经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提出修正，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对大众传媒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表明一切皆是大众的（精英只是幻象），所谓文化研究只是确定什么样的大众而不是区分精英与大众；并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以此他们对传统精英文化进行了一种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

在结构主义涌入文化研究之后，霍尔作为70年代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重新整合了大众文化批判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并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结合起来，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并对北美及亚洲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明翰学派的突出贡献在于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反对经济决定论，而凸现文化及文化主体，尤其是他们以民族志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和青少年反社会的亚文化的跟踪考察、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卓越成效。他们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阈限，对阶级、种族、性别做了行之有效的阐释，并能以一种动态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仍坚持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其实，不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意义都是多维的，对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和现代性批判都有其借鉴价值。

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重新理解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语世界流行一种专注大众传媒和商品符号及文化消费的大众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以符号学和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为工具，以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的阐释为诉求目标，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凸显大众在符号消费中积极的“创造性”“艺术性”和“审美感觉”，以期为大众的消费行为和商品符号乃至人生和生活实际寻求意义。这种凸显大众积极主动性的文化研究，有意无意地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商业流行文化的批判，作为张扬他们文化研究而进行批驳的靶子。其中尤以费斯克因其在学者中的“影响”和“备受争议”而引人注目，成为这一类文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者，他不仅在英语世界，还在港台和大陆都发生着影响，特别在一些青年学者中拥有一批追随者。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有《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电视文化》、《解读电视》及《澳洲神话》等，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主动性与创造性“抵抗”而著称。他以其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立场和对大众文化的躬身践行等，来反驳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不认为大众仅是被动受控的客体，也不再采用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而认为在大众文化中隐藏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进而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是文化游击战中战术上的胜利者，因而对大众文化持肯定乐观的态度。他将大众文化视作大众“怎么做都行的艺术”，在他眼中大众文化是大众“权且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通过“电视的两种经济”的区分等系列论述，推进和深化了霍尔开创的“新霸权主义”文化研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化理论，从而将大众推至前所未有的显要地位。

近年来西方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日趋背离其初衷，这已引起了某些学者的反思和自省。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向四川省部分党政领导干部
赠送2004年《学习时报》